

古典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的 学术成就和贡献

王 承 略

现年93岁高龄的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王绍曾先生,是和已故著名学者顾廷龙、冀淑英相齐名的古典文献学家。《世纪学人 百年影像》一书收录的古典文献学家,只此三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学界的公论。难能可贵的是,三人是至交好友,彼此长达数十年的学术交往,有力推动了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关于顾廷龙、冀淑英两先生的学术成就,王绍曾先生在为他们各自的文集所做的序中,记叙得既详且尽了,在此不再赘述,只就王绍曾先生70多年来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山东文献、张元济研究等诸多方面的成就略抒管见,以此纪念三位先生交谊之笃和相知之深。

王绍曾先生字介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江苏江阴人。1927年考入无锡国专,师从唐文治、钱基博诸大师,研修国学。在校三年,除通读经史子集外,对钱基博讲授的目录学和《文史通义》产生浓厚的兴趣,用力最勤。亲聆钱基博的指导,写成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长达六万言,受到钱氏的激赏,建议学校破例作为《无锡国专丛刊》第一种于1931年正式出版。国专毕业后因校长唐文治之介,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襄助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亲炙于张氏之门,并得以接触到涵芬楼珍藏的宋元明善本,从此兼治版本校勘之学。三十年代初,陆续发表了数篇长篇论文,引

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史通引书考初稿绪论》。前者在半个世纪后,仍被台湾学者王国良教授收入《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1986年增订本,王国良教授认为本文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后者的写作目的在于考察唐以前史籍的沿革得失和存佚,补隋、唐二志之缺漏,为《国风》半月刊6卷1至2期所刊登。此后数十年间,转徙东西,尘坌南北,但目录版本学的研究一直未敢稍懈。建国后来山东济南,先后担任山东机械工业学院、济南工学院图书馆副主任。1960年,以50高龄问学于山东大学著名学者高亨先生之门,得到高先生的赏识,1963年由高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1983年调任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接受了培养研究生的任务。此时,王先生已年过古稀,又患结肠癌动过手术,但王先生在教学之余,以顽强的毅力,高昂的激情,拼搏的精神,完成了等身的著述,走上了事业的辉煌,创造了学术界难得一见的奇迹。

王先生的丰硕成果,主要是近二十多年取得的。但王先生在目录版本学研究方面成名甚早,青年时期就有诸多力作。除上面提到的两篇代表性的论文外,1932至1935年间,还写过《小绿天善本书辑录》、《国专图书馆善本书志》,用版本题跋之体,介绍无锡著名藏书家孙毓修小绿天的珍藏和无锡国专图书馆的元明善本,每一书下,详行款印记,考卷帙分合,明授受源流,多存掌故,文采斐然,有顾、黄诸跋之风。1933年写了《无锡刻书考》,全面梳理无锡华、安、黄、秦四大家的刻书史料,凡四家刻书见于书目记载者一一撮录而出,给予综合论述,既可补无锡志乘之缺,又可展现无锡在印刷史上的辉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王先生用五行相生之次,考证华氏家族的世系,认为华燧、华煜是兄弟,华坚是华隧的子侄辈,华镜是华坚的从子,华琨的“琨”当系“埤”字之讹。弄清了华氏家族的世系,对于鉴别华氏刻书关系重大。1934年他见到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发表《缪荃孙著述目》,感到缪荃孙很多著作并未入录,立

即写了一篇《缪荃孙著述目补》，由《大公报·图书副刊》发表。说明王先生在三十年代，就十分关注乡先辈缪荃孙的学术成就。无怪在他90高龄时，还在从事《缪荃孙研究三种》（包括点校《缪荃孙集》、《缪荃孙书札》、《缪荃孙评传》）。不仅因为缪荃孙是乡前辈，更在于他是中国图书馆之父，是继黄丕烈之后的一代目录版本学大师，其学术成就必须得到继承和发展。

十年动乱期间，王先生被剥夺了著书立说的权力。拨乱反正之后，王先生怀着与时间赛跑的激情，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术研究当中。1981年发表《十八世纪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周永年的生平及其主要成就》，全面系统地评价《四库全书》纂修官、著名学者周永年的学行，指出周永年是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是儒藏说真正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儒藏说推动了《四库全书》的纂修，而周永年本人亦参与其役，不仅从《永乐大典》中搜辑大量佚书，而且还撰写了大量子部书的提要，所以周永年是一个关系到文化升降、学术变迁的重要人物。该文填补了周永年研究的空白，直到今天看来，其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仍然是绝无仅有的。同年，王先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对《校勘学方法论》进行客观的一分为二的剖析，澄清了因五十年代受到批判和否定而蒙在《校勘学方法论》上的种种误解，还胡适以本来面目。1996年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和台湾大学中文系邀请赴台讲学，发表了《如何正确评价黄丕烈在版本学上的贡献》一文，独抒己见，推翻了自洪亮吉到近人余嘉锡的一系列论点，肯定黄丕烈是清代版本学的奠基人，是一代版本学宗师，不但影响到晚清四大藏书家，而且直到今天研究目录版本的学者，亦无不奉为圭臬。王先生的演讲，得到台湾同仁的共鸣。顾廷龙、冀淑英二先生阅读该文后指出，王先生对黄丕烈的评价是极其公允的，一切错误的认识，为之一扫而空。

最能代表王先生目录学、版本学成就的是《山东文献书目》和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前者是地方文献书目的佼佼者，后者是补史志目录的殿军之作。二者都是建国以后目录学研究领域屈指可数的重要成果。

《山东文献书目》是应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之约而编纂的，目的是摸清现存山东文献的家底，为山东省古籍整理的长远规划提供依据。该书于199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共著录了先秦至民国山东先贤著作有版本可考者5208部，又用低一格著录的形式收录了与山东文献有关的非山东人著作1336部。本书创立了地方文献书目编制的新体例。分类体系方面根据图书情况对四部分类法作了适当的调整；著录事项包括书名、著者、版本、书目根据或馆藏，有极强的实用价值；著录方法上诸如对辑佚书的处理，对籍贯与侨居地的取舍，对别集与总集间的互见，对有争议作者的区分，等等，多有创举，带有普遍性的意义，值得编目家参考借鉴。书目在编纂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无法做到全面访查山东境内市、县、学校图书馆，因而还存在着漏收现象。为弥补这一缺陷，从出版之日起，王先生就开始了拾遗补缺的工作。《续编》现已基本完成，收书约4000种，即将出版。王先生寓居济南垂50年，对山左文献情有独钟，以前辈文献学家王献唐先生为榜样，把整理弘扬齐鲁文献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出于整理本省古籍的需要而主编《山东文献书目》，既摸清了急需整理的文献的家底，又是地方文献书目编制领域的创获，真可谓慧眼独具，一举两得。1992年与沙嘉孙合作完成《山东藏书家史略》，是王先生对山东文献的又一贡献。本书实现了王献唐先生的夙愿，将藏书家一一列传，旁征博引，考据精详，汇萃众说，辨正旧闻。所考多达559人，不仅使山东先贤的庋藏业绩，得以赫然彪炳，辉铄峻明，更重要的是重新确立了齐鲁藏书无庸争辩的历史地位。向来研究藏书史的人，以江、浙为重镇，而对齐鲁重视不够。《史略》用雄辩的事实，证明山东藏书非但雄视江苏，甚至超轶浙江，这样就势必促成日后藏书史研究中出现南北映辉、鼎足

而三的局面。王先生为此书撰长篇序文，周一良先生尽二日之力，急读一过，致王先生书中称赞王先生“以八二高龄，撰序论长文，不仅面面俱到，且辨析山左文人不为人知之学术贡献，实不啻一部山东学术史”。程千帆先生则云：“献唐先生以后，一人而已。”至于《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是近年王先生目录学研究和山东文献整理的力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之一，为保存和传承祖国文化典籍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藏书主要辗转而归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王先生有感于海源阁四代主人鸠集守成之不易以及其书终有良好的归宿，对海源阁藏书一直褒奖有加，先后在《周叔弢与海源阁遗书》、《山东省图书馆藏海源阁书目序》等文章中大力推扬。为表彰杨氏家族的功绩，再现杨氏藏书的辉煌，提供目录学、版本学、藏书史研究的素材，王先生满怀热情地整理并订补了海源阁书目五种。在杨氏善本书目著录的每一书下，大量搜辑前人题跋，尽可能把该书的授受源流考辨得元元本本、清清楚楚。为把书目整理得完美无缺，王先生经常请益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的版本学大师冀淑英先生。冀淑英先生有问必答，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书札12通，涉及海源阁遗书70余种。从此事可见王先生谦虚好学的精神，亦可见冀先生诲人不倦、对学术高度负责的优秀品德。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王先生的精心之作，也是他最有成就之作。这部280余万言的巨著，凝聚了王先生整整十年的心血和汗水。大家知道，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术文化的鼎盛时期，有清三百年留给了我们大量的文化典籍，然而民国年间纂修的《清史稿·艺文志》，虽出自吴士鉴、章钰、朱师辙三位名家之手，但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仅著录了9633部，不足以反映清代学术文化全貌。50年代初，虽经武作成撰为《补编》，但去其重复，亦仅9000余部，两者相加，尚不足两万部，与清人著作之盛相去仍远。《志稿》、《补编》的共同缺点，除大量脱漏外，均墨守历代史志目录的陈规，概不加

注版本，所有著录之书，有无刻本、稿本、抄本流传，书存何处，均无从根究。当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时，王先生决心从1983年起，鸠集同志，通力合作，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王先生亲自主持下，奋战十年，终于增补清人著作54888部，而且打破陈规，一律加注版本及书目依据。该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清人著述的大清理，被胡道静先生誉为“有清一代文献括存之大业”。从目录学的角度说，此书是自清中叶补史志目录运动兴起以来二百多年间最大的收获，以体例之新、考辨之精、规模之大巍然屹立于补史志目录著作之林的巅峰，因而得到了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顾廷龙先生为本书作《序》云：“不特公私名簿采录殆遍，著录之有歧异者亦多所辨正。全书网罗清人著述为《清史稿艺文志》及武氏《补编》所未收者，竟达五万四千余种，以类相从，厘然有绪，且各著版本，兼明出处，元元本本，得未曾有。”对本书的体例和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程千帆先生在《序》中则云：“合三家之所得而倍之，于是清人传世诸籍得以略备，虽时值右文，得道多助，然非绍曾之好古敏求，锲而不舍，又未必底于成也。”更对王先生的人品学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胡道静先生尝贻书王绍曾先生，言及清代科技著作《康熙几暇格物编》、《浦柳农咨》等均不载于《清史稿艺文志》，“感《志》之必须再补”，今检《拾遗》，二书具在，足见《拾遗》收录之全，必将大有功于学术文化研究。总之，年过九旬而成此大作，令人至感钦佩。王先生在寿近期颐之际，终将钱门的目录学发扬光大，实乃学术界之幸。《拾遗》出版以后，王先生即着手主编《清史稿艺文志版本知见录》，现已完成大半，指日可成。可以断言，此书必将与《拾遗》合成双璧，在清代历史和学术文化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也将为重修《清史稿艺文志》打下丰厚的资料基础。

王先生在校勘学上的巨大贡献，是年轻时参与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晚年主持整理了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百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史、校勘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被学界称为“保存宋元以来所刻正史之大结集”,“全史中最标准的本子”。伴随《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印而产生的《校勘记》,是一部全史的校勘巨著,是张元济二十年校史成果的结晶。年仅二十岁的王先生,当年即追随张元济左右,在校史处供职尽力。《百衲本二十四史》出版以后,张元济本打算将《校勘记》一并整理问世,但因卷帙庞大,整理需时,加以抗战爆发而未果。一百七十三册的稿子尘封数十载,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时始被借用以作参考。1987年,在张元济诞生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王先生宣读了论文《张元济先生校史始末及其在史学上的贡献》,顾廷龙先生则写了《我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二人不约而同地建议中华书局将《校勘记》的稿本归还商务,由商务印书馆聘请专人整理出版。1989年张元济逝世30周年之际,王先生又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上发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必须得到重视》一文,再次强调《校勘记》的重要价值,呼吁尽快整理出版,从文章的标题不难看出此时王先生焦急期盼的心情。1990年,王先生在见不到《校勘记》的情况下,依据张元济的《校史随笔》和有关跋文,写了《张元济校史十五例》一文,发表于《文献》杂志,文中对《校勘记》迟迟不能整理出版,深以为憾。的确,如果有《校勘记》丰富的资料,总结张元济的校史义例就能更加游刃有余。王先生数年的等待和呼吁终于有了结果,1990年中华书局归还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金史》等15种,1992年又归还了《宋史》(缺一册),其余《晋书》、《周书》、《北齐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元史》等7种则已不知去向。《明史》刻于清代,无需校勘,所以《校勘记》原总共有23种,如今却只剩了16种。因王先生是当年校史处硕果仅存的元老,多年来又为《校勘记》的整理出版奔走呼吁,所以整理《校勘记》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王先生的肩

上。1992年即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主持整理现存的16种《校勘记》。抚视当年自己的手迹和张元济的亲笔,面对已残缺不完的《校勘记》,王先生不禁感慨万千。他抱着对张元济和中国学术极端负责的态度,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校勘记》原稿大都朱墨烂然,几不可辨,许多篇卷条目前后叠出,杂乱无序,所以整理时困难重重,往往几易其稿,还不能令人满意。从发凡起例,到一一整理完毕,足足用去了8年的光阴。如今大功告成,16种《校勘记》已陆续用整理本影印出版。《校勘记》16种,以宋本作底本者12种,以元本作底本者4种,共出校80221条,其中用对校、本校和理校而对宋元底本作了修改者19135条。《百衲本二十四史》校改之谜由此而大白于天下,随之引起了学术界诸多的争论。宋元旧本中的误字到底应不应该在影印时修正,王先生与顾廷龙先生曾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二人得出的结论是完全同意张元济的做法。2001年3月,王先生在海峡两岸文献学研讨会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论文《试论敢为天下先的张元济先生》,系统阐述了对《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校勘记》的看法,认为“自乾嘉大师王鸣盛、钱大昕而后,以如此众多的宋元明善本及名家批校本校勘全史者,惟张元济先生一人而已。其校勘成果,转出王、钱之上”。“只有敢为天下先的张元济先生才能开影印本校改之先河”。“《百衲本二十四史》是集宋元旧本与武英殿本及其他参校本之长于一身的整理本,自成系统,既保存了宋元明旧本的原貌,又有别于原有的宋元明旧本,这是名副其实的百衲本”。2002年6月,王先生又在《江苏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为什么要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对上述结论作了更详尽的补充论证。王先生的这些观点,不仅是对张元济所做出的客观评价,而且对今后校勘学和古籍整理的发展方向,极具指导意义。

围绕《校勘记》的整理出版,王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张元济的研究论文已如上述。这些论文连同《校勘记》的整理,进一步确定了王先生在国内研究张元济的权威地位。王先生对张元济的研究

由来已久，早在1979年，即张元济逝世20周年时，王先生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就发表了《试论张元济先生对我国文化事业和目录学的贡献》一文，引起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该文第二部分被《学林漫录》初集刊登，又为《新华月报文摘报》转载。1982年、1983年间，王先生在该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修订补充，完成了《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一书，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介绍了张元济的家世和生平，肯定了他在近代出版事业中开拓者的地位，分析了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总结他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和经验，深入探讨他整理出版古籍的四大特点，以期为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借鉴。该书是国内外研究张元济的第一部专著。1995年又出版了增订本，主要强调张元济校勘全史的重大贡献。此前，张元济哲嗣张树年于1991年编著《张元济年谱》告成，请王先生撰序，王先生已对这一问题提出申论，顾廷龙先生阅后致函说：“今无第二人能道之矣。”王先生对张元济的研究，一方面是出于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方面却是着眼于学术文化的传承。王先生的用心是良苦的，所获得的成效也是显著的。

与顾廷龙、冀淑英二先生一样，王先生是近二十年来国家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倡导者和参与者。续修《四库全书》的建议，就是他最早提出的。1987年，王先生给中华书局综合编辑室主任冯惠民写信，特别提到清代乾隆以后的清人著作，国内很难搜求，如果连同四库失收的元明人著作，四库馆禁毁删窜的著作，选出三四千种书，在几年内分批影印出版，是完全可能的，建议冯惠民请中华书局的领导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反映，并提出实施方案。当时中华书局总编办公室把此信刊登在《业务情况》1987年第3号上，还加了编者按，供中华书局上下参考，但并无下文。1992年5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匡亚明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王先生又向匡老提出《编印〈四库善本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刍议》。嗣后王先生又写

了《论〈续修四库全书〉》，发表于《文史哲》1994年第6期，文章分析当时续修《四库全书》的有利条件和重大意义，并指出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最终接受了王先生的意见，使《续修四库全书》成为现实。大约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季羨林先生正组织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因对四库存目书学术价值的认识不同，导致了学术界对是否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激烈争论。王先生于1994年12月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印行〈四库存目丛书〉之我见》的文章，声援并支持《存目丛书》的出版，指出四库馆臣之所以把二千多种典籍收入《全书》，把六千七百余种典籍列入存目，是当时清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所承受的能力决定的，乾隆皇帝又惟恐看不到《全书》的最后告成，也使得《全书》的规模不能无限扩大，所以存目中的书并不都是因为所谓“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而被打入另册的，很多书事实上是由于《全书》收书数量有限而不得被著录在存目里，况且时代不同了，对书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库书和存目书之间并不存在鸿沟。这样王先生就从根本上证明了《存目丛书》的出版价值，推动了该工程的顺利进行，对于其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王先生也积极地出谋划策，1992年在《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发表《关于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的三点建议》，1994年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发表《关于编纂〈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的若干意见》，对全书的体例、工作的程序、人员的安排等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很多创造性的建议，后来均得到了采纳。凡此种种，无不说明王先生对全国古籍整理事业的极端热忱和关心，现在这些大项目有的早已结集完成，有的正在继续进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王先生曾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